

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四十年

王 冠 主 编

第 四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

〔美〕罗伯特·索洛 著

刘 勇 译

王宏昌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Robert M. Solow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63

根据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 1963 年版译出

ZĪBĚNLĪLÙN JÍQÍ SHŌUYÌLǜ

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

〔美〕 罗伯特·索洛 著

刘 勇 译

王 宏 昌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46-4/F·97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9 千

印数 0-2 500 册

印张 2 1/4

定价：1.15 元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罗伯特·索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本书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除此以外，作者还有《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R. 多夫曼和P. A. 萨缪尔森合著）和《增长理论：一个说明》等专著。

在本书中，作者以实证方式讨论了现代工业化国家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长远动力的思想。全书由三篇讲演构成，先介绍了美国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资本理论的观点；接着概述为了研究技术进步，资本理论需要作的改进；最后说明了储蓄和投资以及生产力的长期增长三者间的关系。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索洛教授的学术观点和美国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资本理论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因都有助益。但书中有一些观点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请读者参阅时注意。

译稿承王宏昌先生校阅，谨致谢意。

第四卷 序言

本卷考察的历史时期，是1976年——1989年，主要是评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期间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这里又有一个10年。在这以前，有两年的过渡时期，是短暂的“两个凡是”时期；在这之后，我国进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阶段。前一时期已经过去。后一阶段正在进行，我们只能附带加以考察。中间的1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发展时期，因为在这期间提出了过去未能提出的问题，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一些重要方面的有机结合。所以这10年的经济理论不是搞糟了，而是开拓创新，生机勃勃，主流是好的，是搞社会主义，是搞马克思主义。当然支流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

10年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看，内容是很丰富的。诸如，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的运行，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经济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党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经济理论界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只要我们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努力，我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还探索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总体说来，我们已经摆脱了一度困扰我们的一些束缚，诸如规律排队和政策解说之类。尽管现在还没有构筑成十分严谨的科

学体系，但已形成了多种学派的初步认识，相信它们将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经过切磋，求得共识，共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了有助于大家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在本卷汇集了下列一些专题：

第一，将“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归集为一章，以经济理论研究根本性转变的开始为题，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中心内容。我们分别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九章、第十章等章节中，将有关资料加以汇集，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目的，我们在第五章、第六章中对各种观点作了评述。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同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除了在第七章中作了考察外，将这一理论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结合起来，在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中分别就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城乡关系、发展模式、分配方式等的不同观点作了汇集和适当评述。

第五，鉴于消费、人口经济理论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1 亿以上人口的大国的重要性，我们在第十四、第十五章中，将学术界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反映。

第六，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十六章仅就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了评介。

第七，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和体系，在第十七章将不同观点作了介绍，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

10 年中政治经济学既然处于大发展时期，其学说史料也就不能不是极其丰富的了。10 年的史料超过了前 30 年的总和。我们的

述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只能是一些基本的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评论中表明观点，只能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我们殷切希望学术界把它作为引玉之砖，使它成为争鸣之源。一切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批评，我们是热忱欢迎的。

1990年8月

目 录

引言.....	1
序言.....	2
第一章 资本和收益率.....	3
第二章 收益率和技术进步.....	22
第三章 技术进步、总量生产函数和收益率	44
参考资料.....	63

三、	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	138
第六章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讨论·····	145
一、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标准的讨论·····	145
二、	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内涵的研究·····	152
三、	价值源泉与生产劳动规定性关系的研究·····	162
第七章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经济体制	
	改革理论的探讨·····	173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讨·····	173
二、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	186
第八章	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	
	式的研究·····	203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的	
	突破·····	203
二、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涵义及其实现形式	
	的思路·····	215
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研究·····	241
一、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	241
二、	市场体系的理论研究·····	253
三、	市场机制的理论研究·····	260
四、	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	271
第十章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节的理论·····	276
一、	变直接控制为间接控制的理论研究·····	276
二、	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研究·····	287
三、	宏观调节手段的研究·····	299
第十一章	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	314
一、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理论探讨·····	314
二、	中心城市作用的理论研究·····	324
三、	农村经济发展理论的讨论·····	334

第十二章 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换的理论·····	346
一、 经济增长模式理论的探讨·····	346
二、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355
三、 经济增长速度的新观点·····	371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再研究·····	378
一、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 规律的研究·····	378
二、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 研究·····	390
三、 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讨论·····	399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	412
一、 关于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 用的论述·····	412
二、 消费模式·····	418
三、 消费水平·····	422
四、 消费结构·····	432
第十五章 人口、国土、生态环境经济理论的研究·····	436
一、 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研究·····	436
二、 国土经济理论的研究·····	448
三、 生态环境经济理论的研究·····	456
第十六章 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	464
一、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性的论述·····	464
二、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	470
第十七章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和体系的 新探索·····	487
一、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对象的再讨论·····	487
二、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争鸣·····	502
三、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发展的	

新趋势..... 512

附录 本卷部分参考论著..... 518

一、 论文..... 518

二、 著作..... 561

后 记..... 569

第一章

经济理论研究根本性转变的开始

1976年10月，为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以“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被粉碎而宣告结束。自此之后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历史大转变的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两年中，我国理论界批判了“四人帮”的经济理论；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恢复了经济理论的正常研究；进行了经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指导思想；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解放思想，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新的有益的探索，开始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根本性转变。

一、经济理论研究新环境的出现

（一）对“四人帮”经济理论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年轻的经济科学，遭到“四人帮”

的疯狂破坏，受到严重摧残，政治经济学领域理论是非颠倒，各种经济学科几近砍光。经济理论的正常研究完全中断，经济科学园地呈现出一派萧条荒凉景象。^①

对“四人帮”的经济理论的批判，贯穿在这两年中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其中进行集中批判的，一是对“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天津南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本的批判，二是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1. 对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潮的典型代表，作为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一个断层，我们在本书第三卷中已经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评述。这里，只是由于对该书的批判，毕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摆在我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项首要任务，因此有必要对这场批判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国性的广泛批判，在北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和主持的。从1977年6月开始，该所主持召开有10个单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座谈会，至年底共举行了14次，对该书进行了系统批判。在此基础上，该所组织主持召开了北京经济学界四次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会。^②分别对该书的反动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

^① “四人帮”对经济科学的严重破坏和摧残的情况，可参阅《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5期、《经济研究》1978年第5期等刊物发表的有关文章及本书第3卷有关章节。

^② 北京经济学界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次大会分别于1978年3月、4月、5月和6月召开。参见《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5、7、8期。

级法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批判。这四次批判大会的召开，不仅打破了10年之久的我国经济学界的沉闷状况，而且对于重整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起了积极作用。

在首都经济学界举行批判大会之前，1978年1月复刊的《经济学动态》第1期上发表了董辅礪的《“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货色？》的文章，同时，该刊第一、二期连续摘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主要观点，这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对该书的批判起了推动作用。

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批判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了批判“四人帮”极左经济理论的专著《“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该书于197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系统批判“四人帮”经济理论的一个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本是一本系统宣扬“四人帮”反动经济理论观点的书，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2月开始在校内发售，1977年2、3月间大量扩散全国各地。对于这样一本影响极为恶劣的书，迟迟未能加以批判，一直到1978年4月2日，《天津日报》才开始发表批判文章予以批判。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学习通讯》和《南开大学学报》陆续发表了对该书的批判文章。^①

2. 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清算

“唯生产力论”问题，是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是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在1975年春夏之交推向了一个高潮。这种“批判”

^① 关于天津南开本教科书的批判情况，可参阅《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7期。

的矛头直指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1975年春，“姚文元和张春桥先后抛出两篇可称为‘姊妹篇’的杰作”^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②自此之后，他们的御用工具，蜂拥而上，争相鼓噪，炮制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吕达的《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③还有署名池恒、方刚、梁效、方海、宫效闻、康立、延风的文章。^④他们几乎开动了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报纸、刊物书籍、广播，处处充斥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

“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实质是用历史唯心论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反对生产力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这样一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为了清除“四人帮”在“唯生产力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澄清理论是非，肃清其流毒，林子力、有林写了《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该书的初稿于1977年6月内部发行，部分内容于同年11月和1978年2、3月间由中央人民广播

① 林子力、有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② 此两文先后发表于《红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

③ 程越是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写作班子的化名。此文是按照姚文元对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文稿的批注，由他授意起草并经他反复修改定稿的。吕达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控制的一个写作组的化名。此文所批判的《条例》即1975年9月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8条）。

④ 池恒、方刚也是姚文元所控制的《红旗》写作班子的化名。梁效即“四人帮”所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方海、宫效闻、康立、延风，是“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的化名。

电台在“学习”节目中两次连播。1978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了认真的清算，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基本原理，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积极作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唯生产力论”问题讲座之后，紧接着又开播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广播讲座”。^①讲座结合批判“四人帮”的经济理论，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这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是第一次。

通过对“四人帮”经济理论的批判，恢复了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但是，由于这两年来具有“过渡”的性质，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和坚持“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四人帮”的深入批判。同时，即使对“四人帮”所作的批判，还依然受到经济建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批判中所重新认识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还不可能突破“左”的理论观点和传统经济理论观点的框框，这也就自然不能从对“四人帮”的批判中总结出应有的教训，也就难于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发生在历史转折的岁月，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① 为该讲座撰稿的有许涤新、薛暮桥、吴树青、翁志兴、黄振奇、孙光德、张朝尊、蒋家俊、熊懿求、陆迅、宋涛、周朝央、田江海、张曙光、李兴增和薛永应等，还有常州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理论组等单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两个凡是”的争论引起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因此这场讨论一开始就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华国锋提出来的。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做法，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两报一刊”^①社论，宣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不久，同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又重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是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的集中表现和必然结果。^②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③坚持“两个凡是”，也就必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问题。”^④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实质。

“两个凡是”问题上的党内的原则争论，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即关系到是否坚持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阐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

①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社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权威舆论。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62页。

④ 同上书，第35页。